

吴克明



俄国  
东正教侵华史略

甘肃人民出版社

.43

2

责任编辑：冯志毅

封面设计：王兰江

## 俄国东正教侵华史略

吴克明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5 插页1 字数51,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11096·98 定价：0.38元

# 目 录

引言	1
一、俄国东正教和侵华据点的建立	2
(一) 俄国东正教	2
(二) 俄国东正教会在华据点的建立	6
二、东正教会在华的任务	9
三、俄国东正教会侵华活动的概况	12
四、俄国东正教会在侵华中的地位与作用	26
(一) 直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26
(二) 东正教士团在华的政治侵略	31
(三) 积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41
(四) 推行沙俄文化侵略的先导	49
(五) 东正教士团积极参与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 运动	56
(六) 东正教士在华的横行	59
五、俄国东正教会反动势力在中国的覆灭	65
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人员和学生及 其他世俗人员情况	69

# 引 言

二百多年来，地处欧洲的沙皇俄国，积极推行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在对 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先后霸占中国领土共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其面积相当于现在的三个法国，或者五个意大利。同时，强迫清朝政府赔款共约一亿四千万两白银，开辟通商口岸多处，设立公使、领事馆，划分租界地，取得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权，掠夺中国的矿产、森林、水产和其它资源，租借旅大港湾，并勾结其它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输入商品和资本，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为了确保在华的权益，甚至直接派兵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而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土上制造许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和血案等等。总之，沙皇俄国在华的政策，是一种罄竹难书的罪恶政策。在侵略中国的各个方面，沙皇俄国利用宗教——东正教，真正地起到了“牧师”的得力作用。

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各族人民，在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扩张、其中包括反对东正教的侵略行径方面，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者，一次次地粉碎了沙俄灭亡中国和推行“黄俄罗斯”的险恶阴谋，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伟大

的胜利，彻底地清除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包括东正教的势力，废除了各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前，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辛勤劳动。

应当指出，在世界上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或别有用心的人，在所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竭力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事实，千方百计地为俄国东正教会和传教士在华的侵略行径辩护，甚至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编造谎言，大肆鼓吹和美化东正教的侵略罪行，说东正教士是“沟通俄中文化的使者”，是“尊重”中国文化，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为着弄清历史真相，很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让事实来回答：俄国东正教会和教士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友谊”、“福音”呢？还是“侵略”、“灾难”呢？

## 一、俄国东正教和侵华据点的建立

### （一）俄国东正教

东正教，又名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它与天主教、新教同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在罗

马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渐渐地,它们之间的差别愈来愈显著,公元1054年,基督教就正式公开分裂成两个大的派别:一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公教堂,自称“公教”,人们又称它为天主教,这一教派主要分布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西部。二是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正教会,自称为“正教”,即“正宗的教会”,又称东正教。

公元六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攫取了东正教的控制权,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东正教会,虽有自己的首领与一定的独立性,但均受其控制。东正教的分布情况,主要是在地中海东部希腊语地区,主要有希腊、俄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

公元十世纪以前,欧洲东部斯拉夫人一直信仰多神教。后来,在同拜占廷帝国进行长期的战争,以及相互在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基辅罗斯的王族、官兵和从事经济贸易的商人,再加上一部分官吏,比较早地接触基督教,并接受教义,进而虔诚地信奉。

公元912至945年间,正是伊戈尔统治基辅罗斯的时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王族、亲兵、商人和官吏,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此时,伊戈尔的妻子奥尔加也信仰基督教,这对于基辅罗斯的其他王族成员、亲兵、官吏和百姓,都有较大的影响。更为突出的一件事,是伊戈尔的妻子,于公元957年亲自访问了拜占廷帝国,加强了双方的了解与联系,从而使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密切,相互影响进一步增强。

公元978至1015年,正是基辅罗斯公国弗拉基米尔大公执

政期间，拜占廷帝国内部发生内乱，再加之对外作战遭到失败。基辅罗斯公国乘机出兵攻打拜占廷帝国，夺得更多的利益。这时，拜占廷帝国内外交困，皇帝巴西尔二世只好向基辅罗斯公国求和，将皇族公主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作妾。公主安娜带着基督教神甫，一同前往基辅罗斯公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从此，接受洗礼的基辅罗斯人逐渐增加。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受洗，信仰基督教。自此以后，全国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弗拉基米尔还强迫公国群众到第聂伯河一带，集体受洗，正式入教。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还在基辅罗斯公国一些地方建立教会，建造修道院和教堂，派出神甫到各地传教，特别是向北方罗斯人传道。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基辅罗斯公国封建主义制度已正式确立与巩固，封建主便利用基督教，作为统治国内人民的工具。这时，基督教已分裂为两大派别，即天主教和东正教。基辅罗斯公国正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与对立，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麻醉，以及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东正教就成为剥削者的有力工具。

东正教会不承认罗马教皇有着比其他主教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主张除主教之外，其他教士都可以婚娶。中世纪时，东正教直接掌握在拜占廷帝国手里。当时，俄罗斯教会属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基督教会大主教管辖，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1453年，拜占廷帝国由于土耳其进攻而覆灭。此时，莫斯科大公乘机使俄罗斯正教会摆脱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教会，莫斯科大公自命为东正教会的首脑。公元十五世纪末，以莫斯

科为中心的俄罗斯,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的统属后,便向东、西部进行侵略扩张。经过伊凡三世、伊凡四世的统治以后,俄罗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此间,俄罗斯教会紧密地配合俄罗斯帝国推行对外侵略的政策,竭力制造舆论。公元1547年,伊凡四世自封为“沙皇”,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霸占邻国的领土。公元1589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所属下分立出来,单独成立了牧首区,并设立了大主教。之后,便逐渐成为使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这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完全受沙皇控制和利用,对内麻痹劳动群众,强化封建农奴制的剥削与压迫,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

俄国政府为了直接掌握东正教会,于公元1721年专门设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负责领导东正教会的工作。以后,又把宗教委员会改称为“圣务院”,这是东正教在俄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沙皇政府还竭力支持俄国东正教会,力图使它在各国东正教会中夺取霸主的地位。东正教会则公开承认俄国沙皇是俄罗斯教会的最高首脑。至此,东正教会成为沙皇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成为沙皇俄国统治者的得力帮手。而沙皇政权便把东正教作为进行精神麻醉和文化侵略的得力帮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它派教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1页)。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皇俄国将在华的东正教会的外交职能和宗教侵略活动的职能加以调整,适当作了具体分工,改变了在形式上的领导关系。俄国政府确定,东正教会在华的活动,概由俄国东正教的牧首公署直接领导和管



理。关于俄国对华外交方面，均由在华的俄国公使馆负责出面交涉与处理。这种领导体制的改变和职能的具体分工，并不意味着沙俄在华东正教会进行的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这种体制的调整是俄国侵华政策的继续与进一步发展。这样更加有利于俄国在华各个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也为在华的俄国东正教，打着信教传教的合法招牌，进行欺骗和阴谋活动提供了方便。

关于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教阶情况可分为：修士（就是教徒剪发以后）、辅祭、司祭、大司祭、主教、大主教、都主教、牧首等八个教阶。牧首是东正教教阶中最高的等级。修士、辅祭、司祭三个等级，统称谓神父。

## （二）俄国东正教会在华据点的建立

早在公元十三世纪，中俄两国之间曾有过一些交往，而宗教方面也有过初步的接触和联系。当时，中国正处于元朝时期，元政府在北京曾设置了“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鲁斯（即俄罗斯）军士”。（《元史》卷三，《文宗本纪》）。由于俄国的传教士、商人、军人等不断来华，东正教随之开始传入中国。俄国在公元十五世纪以前，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到了公元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期，俄罗斯才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封建统一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现代俄国并不是从这个留里克帝国来的，而是从莫斯科公国演变而来的。“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转引自《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第6页）。

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主义的国家，对外推行穷兵黩武的侵略政策，并开始把魔爪伸进中国黑龙江流域一带。公元1665年，沙皇俄国派遣以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首的武装匪徒，强行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雅克萨城。随同这一股侵略军一起进犯的东正教士叶尔莫根（原为沙俄基连斯克救世主修道院院长），就利用这个条件，在该城附近建立了俄国在华的第一座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教堂。六年之后，即公元1671年，还是这个东正教士又在雅克萨城郊高地上——磨刀石山，建造了另一座修道院，取名为“仁慈救世主”，或者叫“呈献救世主”。公元1675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派遣特使尼古拉·斯帕法里来中国办理外交、商业事务时，俄国东正教会牧首曾指示托博尔斯克大主教沃洛格，加紧“配备神父一名，在前往中国的长途旅行中，为大君主（沙皇）效劳。”（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第183号文件，197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8页）。东正教会的势力还未站稳脚跟，由于中国军民坚决反对俄国的侵略行径，在雅克萨城进行了自卫反击的战斗，并取得了巨大胜利，收复了被俄国侵略者侵占的的雅克萨城，赶走了侵略者，同时，将东正教堂和修道院加以拆除。俄国东正教侵华的活动，暂时被制止。

中国军民在雅克萨城，胜利地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在战争中先后俘虏了俄国人约二百名。在清朝政府的宽大下，经过遣返被俘人员之后，自愿留下的俄国人近百名。这批俄国人被清政府陆续送到北京城，安置在京畿的八旗中的镶黄旗内，地点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他们和满族人一样，享受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过着丰裕、幽静、愉快的生活。在

政治待遇方面，清政府还分别赐给他们四品至七品的官职，得到某些权利。这些最早来北京的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其中不少人取得了清朝八旗中佰什户等职务，有的还担任了清政府中的重要军政官职，如清朝末年，曾担任陕西总督的升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不仅如此，在婚姻，乃至宗教生活等方面，清政府也给他们以特别的优待，专门派人侍候其生活，按时发给春夏秋冬四季所需要的衣物。同时，还允许他们可以与中国人通婚，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清政府专门拨给他们一块庙地，以供他们作为进行宗教祈祷活动的教堂。后来，长期居住的俄国人，把这块庙地改建为东正教堂。教堂地址现在北京市东直门内。

公元1692年，俄国为了使其在华进行宗教侵略合法化，建立永久性教堂，曾致函清近侍大臣，“请至圣皇帝降旨，准予中国地方建造教堂。我俄罗斯商人愿于中国建造教堂，如蒙至圣皇帝指给地址，我俄罗斯国君主等，将按价出资建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155—156页）。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清政府明确地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在咨文中说：“查得西洋各国之人来中国，只是永久居留者曾建教堂，并无于我国续建教堂之例。故此亦毋庸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154页）。

早期来北京居住的俄国俘虏中，有一个东正教会的司祭马克辛·列昂捷夫（即马克西姆，康熙皇帝曾封赐他七品官职），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发展了一些教徒，并进而搜集京都的有关情况。马克辛·列昂捷夫在华的宗教活动，得到了俄国西伯利亚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葛萨阔夫的赞赏。

公元1695年，伊格纳蒂·李姆斯基·葛萨阔夫委托即将来华的商队，特将东正教会证书亲自送给马克辛·列昂捷夫神父，并正式把北京这块庙地所设立的教堂，命名为“尼古拉”教堂，即“罗刹庙”的北馆。（后来改名为俄罗斯北馆。）并且还指示马克辛说：“你被俘虏对中国人不是无益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依靠你在他们中显示出来，”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的立足点”。（阿多拉斯基：《东正教两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载《东正教之友》1887年3月号，第346—347页，喀山俄文版）。北京“尼古拉教堂”的正式建立，为沙俄向中国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前哨基地。

## 二、东正教会在华的任务

俄国政府利用东正教会，“作为对外政策”的有力工具，以更快的速度“打开中国的窗户”（格列勃夫：《北京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2页），从中窃取更多的权益，销蚀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反抗精神。公元1700年6月29日，彼得一世向西伯利亚行政中心托博尔斯克发出特谕：要求他们在中国发展教徒，挑选精明强干的青年传教士来华，“引导中国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和全体居民赞助此项（注：指宗教）神圣事业”。（《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四卷，第1800号，转引自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1905年彼得堡出版，第31—32页）。同时，他还特别指示来华的俄国东正教士，“逐步地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愚妄无知、执迷不悟的人生灵，皈依真正的上

帝”。（《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四卷，第1800号，转引自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第31—32页，1905年彼得堡出版）。东正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教的幌子，容易“接近居民，因而较其他职业的人员更便于研究该国情况。他们可以向政府提供从我国（注：指俄国）国家利益看来不可缺少的情报。没有这些情报往往使正确提出纯属政治的问题变得很困难”。（费奥多西：《俄国驻朝鲜传教士团》）。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在给前来中国的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此人是俄国派驻北京的第七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团长，或者叫领班）的指示中，就明确地要求他对宗教笃信不渝，在华活动要举止端庄持重，立身处世要符合神圣的修士身份。还要求他们到中国去必须努力学会使用汉语，以利于联络感情，更有效地向中国居民传教授道，接受所谓福音真理。另外，指示他们在接受新教徒入教要谨慎，并尽一切可能，千方百计地使信教的中国人，对东正教义虔诚不移。此外，还要求约阿基姆·西什科夫斯基每年必须向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和所属的教区的主教作出详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当地居民中领洗的人数、时间，以及受洗人的情况；同时，要开列出新参加东正教人的姓名、身分、年龄等情况。宗务会议对于传教人员应具有的姿态、作风和遵守的规则等等，都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与要求。譬如传教人员在对待汉人和驻在北京的其他民族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谦恭、温和、庄重、沉着，注意尊重和照顾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特别提醒团长，要他在赴北京途中和驻北京期间，为执行委任的职务，决不能做出任何与所任的职位和身份不相称、以及和所担负的职位无关的泄密事情。再三强调要严格保守秘密。有

关涉及国家秘密的任何事情，绝对不许在私人信件中透露。要遵照彼得大帝颁发的谕旨所规定的去做。否则，一定要受到命令上规定的惩罚，决不宽恕。如果修士大司祭有机会能与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或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在任何场所相遇和交谈时，要亲热地对待他们，但同时要保持谨慎；北京教堂于二月份奉献节期间，要举行宗教庆祝活动；在规定的日子里，要为每一个已故的享有盛誉值得后人怀念虔信上帝的沙皇、大公、俄国皇帝和皇室成员举行追思礼拜，为死者祈祷。除上述规定外，还着重要求传教士团在紧急情况下，尽量把当地动态的情报认真详细地写成书面材料，直接上报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53—58页）。不仅如此，沙俄外交委员会曾明确地指示东正教士，要想方设法地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郭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2页）。对于俄国驻华东正教士团的性质、任务和起的作用，东正教会的大司祭英诺森·涅米罗夫作了最清楚的供认，他不加粉饰地说：东正教会“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不言而喻，政府的愿望是通过教会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英诺森：《在华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6年10月号，第678—679页）。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比较公正地认为，从1727年俄国东正教派出驻北京布道团开始，“俄国东正教会的目的不在于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而是作为沙皇俄国政府的情报机关或外交机关成立的”，因此，“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到清交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约一百三十年间，包括上述雅克萨（按：指清军在雅克萨战役中俘虏的俄军）四十五人的子孙（注：

俘虏四十五人系不确实),信徒总数尚不超过二百人;可是,从俄国派往中国的东正教传教士总数,在一百三十年之间竟达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一事实,可以如实说明,这些传教士团从事间谍活动而忘掉了传播‘福音’的本身业务;也可以从中想象,俄国传教士在沙皇俄国的对华政策中曾何等活跃”。(佐伯好郎:《中国基督教研究》(昭和十九年版)第三册,第469—470页)。

### 三、俄国东正教会侵华 活动的概况

沙俄在未正式派遣东正教士团来北京前,就充分地利用西方国家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窃取中国的有关情报。公元1675年,俄国特使斯巴法里——米列斯库(尼果赖)在北京期间,曾与充当清政府译员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斐迪南·维尔比斯特,比利时人)相勾结,窃取了一张中国地图和有关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战略计划等核心机密。斯巴法里在北京居住期间,通过耶稣会教士刺探了一些情况:

①中国人(注:这里指满人而言)对他的出使感到高兴又不高兴。高兴是因为他们的敌人尼堪人得知俄国朝廷同清政府谈友好,会以为俄国军队可能来援助清政府;不高兴是因为俄国人已经非常接近清朝的边界,并正在建造寨堡。②他在华时不被人看重。③西方国家的耶稣会教士(在华活动的教士),希望俄国能派出军队攻打一下中国,使他们认识一下沙

皇陛下是什么人。④如果俄方不交出清政府索取的逃人根忒木尔，清政府就要攻打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这两座城堡（注：阿尔巴津即雅克萨，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均为中国的领土，被沙俄侵占）。此外，耶稣会教士表示将乐意为俄国大君主效劳，就象为上帝效劳一样。（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52—53页，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公元1688年，俄国使臣尼·达·维细科夫（魏牛高）到北京后，又与南怀仁秘密联络，也从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等机要情报。公元1689年，中俄举行边界谈判时，俄国特使戈洛文（俄国御前大臣兼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曾与担任清政府译员的耶稣会传教士张诚（法国人，Jean-Francois Gerbillon，弗朗索瓦·热拉皮翁，张诚是他所用的华名，1687年来中国为天主教耶稣教会传教士。清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担任清朝政府的翻译）和徐日昇（Thomas Pereira，托马斯·佩雷拉清朝初期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到北京，协助南怀仁修订过历法，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以翻译身份随清政府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参加《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与签订）秘密联络，使俄国大得好处。对此，俄国谈判代表戈洛夫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应该多么感谢你（注：指徐日昇）。你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们要让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获得同等价值的报答，知道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徐日昇日记》，第五十六节，1689年9月8日）。耶稣会传教士张诚也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写



道：俄国使节（注：指戈洛文）“向我们保证他定将竭力请求沙皇优待我们教会派驻莫斯科的人员，以酬谢我们在北京宫廷和这次谈判（注：指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两度为俄国所作的一切斡旋”。（《张诚日记》，1689年9月8日）。

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侵华初期，主要是从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情报的搜集工作，其途径是混入来华的使节团和商队中进行非法活动。从公元1689年9月8日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始，至公元1727年，其间三十八年，大凡沙俄派遣使臣和商队来华，一般都配备若干东正教士，混进商队和使臣随从人员之中，到京进行刺探中国情报的阴谋活动。如1697年俄国驻尼布楚城长官萨莫伊尔·费多罗维奇·尼科列夫为请准许商人等来华贸易事致清政府索额图呈文：“兹有于205年（注：就是公元1697年）由莫斯科派出尼布楚连长瓦西里·舍尔辛为该商人等之领队，并派出马弁三人，念经神甫一人，缮写书信之司书一人，通事一人，随同前往。瓦西里及商人等一行，共计一百四十一人。望予接待，拨给栈院，并准其自由贸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181页，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同年，康熙允准俄商来华自由贸易。又如公元1703年，俄驻尼布楚城长官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希什金为俄国官商前往北京贸易事致黑龙江将军沙那海函：“特派巨商伊万·萨瓦捷耶夫及同伴德米特里·鲍热多莫夫、伊万·克留科夫、列昂捷伊·兹维列夫、司书列昂捷伊·季托夫人等……偕同携有俄国货物之商队，由皇都莫斯科前往中国，以便出售俄国货物，购进中国货物。涅尔琴斯克（注：即中国的领土尼布楚城，1658年被俄国侵占后，改名涅尔琴斯克）并派有伊尔